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4.04.006

# 企业家精神、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来自老字号的新证据

张远记<sup>1</sup>,王飞鹏<sup>2</sup>

(1. 烟台理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3;2. 山东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企业家精神为新时代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基于2010-2022年山东地级面板数据,选取山东各地区每百万人拥有省级老字号的数量来衡量区域企业家精神,运用双维固定模型,实证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此结论经过系列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对于构成新质生产力的三个核心要素,企业家精神不仅能够增加新型劳动者供给、拓展新型劳动资料提质、促成新型劳动对象发展,同时也能促进三要素优化组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区域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动力转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的激励作用更强。结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因此,在出台培育蕴藏丰富企业家精神的老字号政策措施的同时,各地应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添助力。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老字号

**中图分类号:**F272;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4)04-0074-14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把握其中蕴含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机理,有助于更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动力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sup>[1]</sup>。企业家作为企业微观主体的经营者,肩负着创新创业、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践的重任。而企业家精神是根植于决策者内部的企业家才能和特质的集合,具有冒险精神,不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是企业家群体的共性特征<sup>[2]</sup>。老字号企业作为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遗产,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质量和竞争力。老字号企业创新和转型的历史就是企业家精神的现实写照,因此,从老字号新发展角度探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更能厘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和实践价值。

近年来,学者从多维特征、历史传承、与政府政策的相互作用等角度讨论了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和经

收稿日期:2024-04-07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数字化赋能山东老字号转型升级研究”(23CSDJ64)

作者简介:张远记(1974-),男,山东菏泽人,烟台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创新管理;王飞鹏(1974-),男,湖南祁阳人,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认为企业家精神可通过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等因素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动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sup>[3-5]</sup>。新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企业家精神能够提高企业对外部信息的敏感度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企业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能力,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sup>[6]</sup>。与此同时,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性和高效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sup>[7]</sup>。基于此,本文提出企业家精神能够提高组成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资源配置,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效率和动能转换,进而有利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选取2010-2022年山东地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老字号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文献。已有研究多以专利申请、企业新增数量等指标来反映企业家精神,本研究基于地区老字号拥有数量衡量企业家精神,发现老字号传承与创新的精神特质激发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推进地区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第二,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视角。本文将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联系起来,从新质生产力影响机制系统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视角为理解企业家精神如何通过影响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企业家精神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存在对商业的文化偏见和冷漠,但《管子》一书中明确了商人的企业家精神。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商业和文化达到了巅峰,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技术创新与金融工具的进步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持<sup>[8]</sup>。在明清时代,商业团体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商业活动和市场的扩展,同时,手工业的作坊及工厂的完善,以及商业模式运作与家族管理体制的创新,也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清朝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企业家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使企业家成为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独立社会阶层。晚清时期,工商业的重视和商人群体的多元化,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企业家阶层逐渐确立了尊崇地位。总的来说,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创新和坚韧的特质,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创造才能与探索勇气。这股勇气不仅在技术创新领域得到体现,同样也反映在企业管理体制的革新之中<sup>[9]</sup>。尽管受到儒家文化的“轻商、抑商”影响,中国企业家精神与西方学者所描述的企业家精神相似,体现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企业家精神经历了冒险、探索和创新三种表现形态<sup>[10]</sup>。

老字号企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业实践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认同,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和作用<sup>[11]</sup>。这些企业在传承与创新中展现的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它们坚守传统工艺和经营理念,通过维护品牌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持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同时,老字号企业对现代市场需求的敏感和适应,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不断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保持品牌活力和竞争力,成为区域经济的亮点。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变化而不断发展,包括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等特质<sup>[12-14]</sup>。在中国语境下,老字号企业的企业家具备家国情怀,拥有坚强的毅力,勇于面对失败,保持定力,在行业领域精耕细作。它们能够把握发展机遇且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拥有系统观念,以问题为导向且遵循守正创新的理念<sup>[15]</sup>。这种精神不仅推动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区域内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老字号企业还通过持续的市场调研和消费者行为分析,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把握市场脉络,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它们的敏锐市场洞察力和灵活应变能力,激发了区域内其他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区域商业环境的整体提升和经济生态的优化。

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企业家精神被广泛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它不仅关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更在区域经济层面上,通过企业家精神的集聚与传承,塑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和创新氛围,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11]</sup>。具体表现在:一是商业文化的形成。企业家精神的集聚和传承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商业文化,鼓励创新和创业,推崇效率和效果,倡导诚信和责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创新氛围的营造。企业家精神的传播和实践营造了鼓励创新的氛围,激发企业投入研发,个人尝试新职业道路,社会对新技术和新思想更开放和包容。三是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吸引人才和资本,企业家的成功案例和故事激发创业热情,成为其他创业者的榜样和导师。四是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创新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引导区域经济向更高附加值产业转移<sup>[12]</sup>。五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创新和创业活动推动新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商业文化形成,营造创新氛围,吸引人才和资本,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 (二)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 1. 新质生产力的中介机制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特点是创新<sup>[16]</sup>。老字号企业家精神兼具传承与创新特质,关键在创新,通过系列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三要素不断跃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提升,尤其是新型劳动者的发展,成为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家作为创新的先锋,承担着培养和塑造新型劳动者的重要职责。他们通过构建以创新和终身学习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激发员工的学习动力和创新潜能<sup>[17]</sup>。在此过程中,企业家不断引入新的教育模式和知识传播机制,如内部培训、在线开放课程以及研发实验室,以此促进员工技能的多元化和知识结构的优化。这种对人才的深度投资,不仅提升了劳动者的个人竞争力,也为企业带来了更高效的工作模式和更具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进而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当前的经济转型中,企业家精神在新型劳动资料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如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已逐渐演变为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劳动资料<sup>[18]</sup>。企业家通过引进和融合这些先进的数字化资源,对传统生产流程进行深度改造,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这种转变不仅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产品和服务的整体质量。例如,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精准监控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这些新型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新增值,也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企业家精神在推动新型劳动对象的发展方面,同样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型劳动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产品,而是扩展到服务、知识、信息、数据等无形资产领域<sup>[19]</sup>。企业家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营销策略,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和客户群体。数字化平台的运用,使得企业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企业家也利用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等新兴渠道,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和联系。这些新型劳动对象的创新开发,不仅丰富了市场的多样性,也提高了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首先,技术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作为创新的先锋,通过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企业的技术革新,从而带动整个行业乃至区域经济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sup>[20]</sup>。其次,企业家精神强调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家通过精准的市场洞察和战略决策,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提升资源使用效率<sup>[21]</sup>。此外,企业家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最终,这些行为共同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新变化,为区域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提供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新型劳动者的培育不仅增强了人才的创新和学习能力,而且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动力;新型劳动资料的运用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推动了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新型劳动对象的创造则不断拓宽市场边界,丰富了消费者的体验,激发了新的消费需求。三者的协同演进,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的成长,还对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区域经济带来了新的动力源泉,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企业家精神通过培育新型劳动者产生智慧动力,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说3:企业家精神提升了新型劳动资料运用,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说4:企业家精神拓展了新型劳动对象边界,激发了消费需求,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假说5:企业家精神促进新质生产力三要素的优化组合跃升,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 2. 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机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发展迅速。其具有广泛覆盖、经济普惠和高效率运作的特性,能够显著识别并培养具备创新与创业特质的杰出企业家,并帮助他们投入创新实践。在宏观层面,由于存在高昂的运作和监管开支,传统金融体系往往偏好于在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发达的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投入资源,这造成了非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在获取传统金融服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短缺,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效延伸,通过提供移动支付、微型信贷等服务,增强了这些城市的居民对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和便捷性,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了融资和创业的障碍,从而激发了边远地区企业家的创新潜力和创业热情,确立了他们在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在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而那些充满成长潜力和创新活力的老字号企业却常因金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难以实现快速发展,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配置失衡”<sup>[22]</sup>。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增强对有潜力但资金短缺企业的识别与支持,为中小企业等边缘市场主体提供资金援助,激励实体经济的创新与创业。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广泛性和便捷性,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非生产性经济活动,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知识的优化流动,有效减少贫困,缓解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为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动力<sup>[23]</sup>。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有助于解决老字号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6: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激励企业家精神,进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分析,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的逻辑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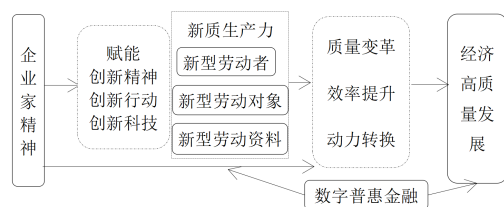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

### 三、研究设计

#### (一)变量选择

##### 1. 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hqdi)是指在特定区域内,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创新驱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等措施,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发展模式。其宗旨在于通过有效整合这些新发展理念,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并保持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状态。本文参考孙豪等(2020)的研究<sup>[24]</sup>,构建了包括5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详见表1。创新发展旨在提升发展动力,通过理论革新、体制优化、科技突破和文化创造提升产出效率,将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协调发展关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利用需求结构等四个关键指标来衡量。绿色发展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通过创新绿色市场、技术和投资,转变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开放发展强调内外联动,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实现共赢共享。共享发展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提升,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并通过政府再分配调控促进发展成果共享。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进行加权,最后熵值测得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表1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GDP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研发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地区生产总值
		投资效率	投资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技术交易活跃度	技术交易成交额/地区生产总值
	协调发展	需求结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城乡结构	城镇化率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债务负担率	地方政府债务/地区生产总值
	绿色发展	单位GDP能耗	标准煤/地区生产总值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能源消费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单位产出的废水	废水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产生的废气	二氧化硫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开放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外商投资比重	外商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市场化程度	地区樊纲市场化指数
		金融发展程度	各项贷款增长额/地区生产总值
	共享发展	劳动者报酬比重	劳动者报酬/地区生产总值
		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借鉴邵传林(2024)的研究思路<sup>[1]</sup>,选取每百万人拥有的老字号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sdbrand*)的代理变量。这一指标的选取基于老字号作为无形资产和品牌资源的特性,它们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经营智慧,而且其独特的工艺和原创性产品与服务体现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深刻理解和适应能力。老字号的广泛分布和区域特色反映了当地的商业传统和历史底蕴,而缺乏老字号的城市可能意味着历史上商业发展的不足,从而缺乏支撑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文化土壤。老字号的持久传承展现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即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和永不满足的精神。这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支撑,使得老字号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一个地区老字号的密度多少,直接关系到该地区企业家精神资源的丰富程度。

## 3. 中介变量

新质生产力(*nmp*)代表了传统生产力在质的层面上的一次飞跃,它为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注入了全新的意义和内涵。本文参考刘建华等(2024)的做法<sup>[25]</sup>,围绕新型劳动者(*laborer*)、新型劳动对象(*lobject*)和新型劳动资料(*mop*)三个关键要素,构建了一个旨在量化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时代,不仅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得到提升,而且劳动者的范畴也在扩展。本文从培养投入和劳动产出两个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新型劳动者要素的量化指标体系。新型劳动对象的丰富性体现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新型劳动资料则聚焦于数字基建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每项得分由熵值法测得,该体系详尽地涵盖了区域生产力转型的关键要素,具体内容详见表2。

表2 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新质生产力综合水平	新型劳动者	培养投入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	+
			百人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	+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
		劳动产出	发明专利授权量	+
			技术市场成交额	+
			单位GDP能耗	-
	新型劳动对象	新兴产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
			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
		未来产业	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
			新型劳动资料	数字基建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	+		
	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量		+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4. 控制变量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参照李政和刘丰硕(2020)<sup>[26]</sup>与蒋长流和江成涛(2020)<sup>[27]</sup>做法,设置如下:政府干预(*gov*),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hc*),用区域内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占年末人口数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city*),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dl*),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贸易依存度(*treadd*),用进出口总额占区域GDP的比重表示。详见表3。

表3 各变量指标

类型	名称	符号	含义
因变量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i>hqdi</i>	熵值法测得,参考孙豪等(2020)的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自变量	企业家精神	<i>sdbrand</i>	区域内每百万人拥有老字号数量
中介变量	新质生产力	<i>nmp</i>	参照刘建华等(2024)的做法,用熵值法测得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三个要素组合的综合新质生产力指标
	新型劳动者	<i>laborer</i>	从培养投入和劳动产出两个维度构建指标
	新型劳动对象	<i>lobject</i>	由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两个维度指标构成
	新型劳动资料	<i>mop</i>	由数字基建和数字技术两个维度指标构成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	<i>gov</i>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人力资本	<i>hc</i>	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占年末人口数的比重
	城镇化水平	<i>city</i>	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i>fdl</i>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
	贸易依存度	<i>treadd</i>	进出口总额占区域GDP的比重

## (二)模型设计

为验证企业家精神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比较了FE(固定效应模型)和RE(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138.22,且 $\text{Prob} > \text{chi}^2 = 0.000$ ,表明FE模型比RE模型更能捕捉到数据中的个体异质性。FE模型通过差分操作消除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定效应,这有助于减少模型中的不可观测异质性,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估计结果。因此本研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构建方程(1)进行假说验证。

$$hqdi_{i,t} = \alpha + \alpha_1 sdbrand_{i,t} + \sum \alpha_k control_{i,t} + 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hqdi*代表地区*i*在*t*时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sdbrand*代表地区*i*在*t*时间的企业家精神指标,*control*代表一切控制变量,*u<sub>i</sub>*、*δ<sub>t</sub>*分别代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sub>i,t</sub>*代表随机扰动项。

## (三)数据来源

山东17地市地区层面的变量数据以及新质生产力三要素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23)》《山东省统计年鉴(2011-2023)》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由于莱芜市2019年1月正式划入济南市,成为莱芜区,2019-2022年莱芜市和济南市的数据以划区之前的口径统计,以期获得平衡面板数据。各城市老字号数量来自山东省商务厅公布的第一批至第六批山东老字号名单,由作者按照归属地城市手工整理获得。样本数据的部分缺失值用插值法进行补充,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4。

表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i>hqdi</i>	221	0.398	0.398	0.047	0.305	0.491
企业家精神	<i>sdbrand</i>	221	3.034	2.189	3.145	0.253	17.35
新质生产力	<i>nmp</i>	221	0.382	0.299	0.280	0.007	1
新型劳动者	<i>laborer</i>	221	0.454	0.408	0.293	0	1

续表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型劳动对象	<i>lobject</i>	221	0.297	0.142	0.319	0	1
新型劳动资料	<i>mop</i>	221	0.458	0.401	0.294	0.013	1
政府干预	<i>gov</i>	221	0.110	0.105	0.027	0.060	0.182
人力资本	<i>hc</i>	221	0.021	0.013	0.023	0	0.113
城镇化水平	<i>city</i>	221	0.569	0.582	0.120	0.231	0.763
金融发展水平	<i>fdl</i>	221	2.062	1.923	0.668	1.143	3.985
贸易依存度	<i>treadd</i>	221	0.312	0.244	0.232	0.035	1.006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5报告了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核心检验结果。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了递进式的回归策略。第(1)列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企业家精神指标(*sdbrand*)的回归系数为0.003且通过了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第(2)列至第(6)列在依次加入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贸易依存度等控制变量,结果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数除第(2)列外,其余都稳定在0.003,且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假说1得到验证。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i>hqdi</i>	<i>hqdi</i>	<i>hqdi</i>	<i>hqdi</i>	<i>hqdi</i>	<i>hqdi</i>
<i>sdbrand</i>	0.003**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i>gov</i>		-0.162 (0.340)	-0.129 (0.363)	-0.205 (0.346)	-0.326 (0.253)	-0.335 (0.248)
<i>hc</i>			0.199 (0.291)	0.208 (0.271)	0.274 (0.263)	0.284 (0.271)
<i>city</i>				-0.055* (0.028)	-0.057* (0.030)	-0.057* (0.030)
<i>fdl</i>					-0.019* (0.010)	-0.020* (0.010)
<i>treadd</i>						0.009 (0.018)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21	221	221	221	221	221
<i>R</i> <sup>2</sup>	0.806	0.807	0.808	0.812	0.819	0.819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里的数值为标准误。下表同。

### (二) 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一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其技术创新、基础服务、营商环境等水平也越高,进而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鉴于



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而且这一误差造成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可观测因素存在,使得模型估计存在内生性偏误。基于此,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渊源深远,从大宋时期的商业繁荣到明清时代商帮的迅猛崛起,这一精神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进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历史上的企业家行为扮演了关键角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从历史商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借鉴 Ting Chen 等的研究<sup>[28]</sup>,本文选取了明朝时期各地区每万人拥有的进士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以衡量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的密集程度,以及资源的可获取性和商业发展的兴盛状况。进士属于文化知识的结晶,与企业家精神有较强的相关性,但距离当代久远,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几乎无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严外生”与“强相关”条件。表6中的第(1)列工具变量(IV)结果显示,K-Paapr LM统计量 p 值为0.000,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Wald F统计量为24.04,大于10%水平临界值16.38,表明无弱工具变量问题。由第(2)列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企业家精神在1%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基准模型的可靠性。

表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明朝进士数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IV</i>	0.000224*** (0.0000457)	
<i>sdbbrand</i>		-0.00912*** (0.00359)
<i>gov</i>	-12.47 (9.063)	0.688*** (0.167)
<i>hc</i>	-23.815 (10.314)	-0.309*** (0.136)
<i>city</i>	10.605 (2.14)	0.272*** (0.055)
<i>fdl</i>	0.618 (0.254)	0.011*** (0.005)
<i>treadd</i>	-4.48 (0.991)	-0.047*** (0.017)
常数项	-1.445 (0.980)	0.193*** (0.018)
个体效应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Kleibergen-Paapr LM 统计量	30.24 (0.000)	
Kleibergen-Paapr Wald rk F 统计量	24.04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临界值	16.38	
<i>N</i>	221	
<i>R</i> <sup>2</sup>	0.2252	

###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孙英杰等(2019)的做法<sup>[29]</sup>,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重新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从表7中的第(1)列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回归系数是0.002,且在1%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说1。

延长观察窗口。为消除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前后期带来的相关影响,参照张远记和韩存(2023)的做法<sup>[30]</sup>,表7中的第(2)列把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第(3)列把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无论解释变量的滞后,还是被解释变量的前置,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结果依旧稳健。

表7 其他稳健性检验

	(1)	(2)	(3)
	<i>ols</i>	<i>hqdi</i>	<i>F.hqdi</i>
<i>sdbrand</i>	0.002*** (0.001)		0.004*** (0.001)
<i>L.sdbrand</i>		0.003** (0.001)	
<i>gov</i>	0.308 (0.187)	-0.334 (0.218)	0.147 (0.279)
<i>hc</i>	-0.131 (0.144)	0.326* (0.190)	0.536** (0.225)
<i>city</i>	0.007 (0.028)	-0.060** (0.026)	-0.020 (0.041)
<i>fdl</i>	0.002 (0.005)	-0.023*** (0.007)	-0.019** (0.008)
<i>treadd</i>	-0.008 (0.023)	-0.003 (0.023)	-0.004 (0.021)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i>N</i>	221	204	204
<i>R</i> <sup>2</sup>	0.581	0.791	0.786

## 五、进一步分析

### (一)中介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企业家精神不仅直接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效应,还可以通过新质生产力以及组成新质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进一步验证新质生产力和三个要素的中介传导机制。由于中介变量往往充当“部分中介”的角色。借鉴江艇(2022)的建议<sup>[31]</sup>,在经济研究中较为合理且常见的作用渠道检验做法是:提出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M,这些变量和Y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在逻辑和时空关系上都比较接近,以至于不必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手段来研究从M到Y的因果关系,然后仅看X对M的影响。即只考察方程(1)和(2),不考察方程(3)。因为从构成新质生产力三要素的主要指标上看,如研发投入强度<sup>[32]</sup>、专利授权<sup>[33]</sup>、数字技术<sup>[34]</sup>等指标都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为避免中介变量内生性问题,不必再对方程(3)做进一步考察。

$$Mediator_{i,t} = \beta_0 + \beta_1 sdbrand_{i,t} + \sum \beta_k control_{i,t} + u_i + \delta_t + \tau_{i,t} \quad (2)$$

$$hqdi_{i,t} = \gamma_0 + \gamma_1 sdbrand_{i,t} + \gamma_2 Mediator_{i,t} + \sum \gamma_k control_{i,t} + u_i + \delta_t + \xi_{i,t} \quad (3)$$

方程(2)中的  $Mediator_{i,t}$  表示中介变量。

表8中的第(2)至(4)列分别代表中介变量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三要素的中介检验结果,企业家精神对新型劳动者和新型劳动资料回归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对新型劳动对象的回归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分别验证了假说2、假说3和假说4。第(1)列是新质生产力三要素优化组合效应的回归模型,回归系数是0.025,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5。

表8 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7)	(8)
	<i>nmp</i>	<i>laborer</i>	<i>lobject</i>	<i>mop</i>	<i>hqdi</i>	<i>hqdi</i>	<i>hqdi</i>	<i>hqdi</i>
<i>sdbrand</i>	0.025*** (0.008)	0.045** (0.019)	0.037*** (0.011)	0.019** (0.008)	0.008* (0.004)	0.002 (0.001)	-0.047 (0.028)	-0.007 (0.010)
<i>sdbrand</i> × <i>dfi</i>							0.009* (0.004)	0.001 (0.002)
<i>gov</i>	2.131** (0.877)	4.305* (2.557)	2.164* (1.272)	1.160 (0.812)	-0.637 (0.417)	-0.366 (0.253)	-0.498 (0.480)	-0.369 (0.252)
<i>hc</i>	-0.628 (0.897)	0.395 (2.705)	-2.285 (1.511)	-0.412 (0.820)	-0.122 (0.471)	0.107 (0.246)	-0.017 (0.518)	0.107 (0.246)
<i>city</i>	-0.163 (0.153)	0.771* (0.392)	-0.085 (0.242)	-0.224* (0.128)	-0.093 (0.071)	-0.026 (0.033)	-0.016 (0.081)	-0.025 (0.033)
<i>fdl</i>	-0.010 (0.030)	-0.016 (0.093)	0.142*** (0.051)	-0.127*** (0.022)	-0.027 (0.021)	-0.025*** (0.008)	-0.029 (0.021)	-0.025*** (0.008)
<i>treadd</i>	-0.022 (0.128)	-0.977*** (0.241)	0.027 (0.192)	0.053 (0.094)	-0.045 (0.041)	0.020 (0.022)	-0.034 (0.044)	0.020 (0.022)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21	221	221	221	52	169	52	169
<i>R</i> <sup>2</sup>	0.883	0.170	0.748	0.926	0.876	0.832	0.886	0.832

### (二)异质性分析

在深入探讨城市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城市的规模和商业流通传承的角色显得尤为关键。城市的规模不仅反映了其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还关联着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和市场潜力。大型城市通常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例如先进的交通网络、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些都能够为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创新平台。此外,大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还能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提供肥沃的土壤。商业流通传承作为城市发展历史的积淀,对城市的商业模式、文化氛围和创新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城市商业的传承和演变不仅能够保持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能够促进新旧商业模式的融合与创新。具有悠久商流传承的城市往往拥有更加成熟的商业文化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这些都能够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提供有力的支持。然而,不同规模和商流传承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利程度、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小型城市可能在基础设

施和交通网络方面存在不足,这可能会限制企业家的视野和商业活动的范围。而一些新兴城市可能缺乏深厚的商业文化和历史传承,这可能会影响其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市场机制的成熟。这些差异可能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及其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产生影响。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本文借鉴李政和刘丰硕(2020)的研究思路<sup>[26]</sup>,根据城市的历史传承商流和规模,将山东地级市分成两组,一组是具有较好商流传承和较大规模的城市,如济南、青岛、淄博、济宁,这些城市被定义为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另一组则是其他一般城市。表8中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的回归系数是0.008,且在10%统计结果上显著,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在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相较于一般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为完善,交通物流更为便利,人才聚集效应更加明显,从而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和创新环境。这些城市通常拥有更加成熟的市场体系和更加开放的商业文化,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因此更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三)调节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创新精神,促进创业活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不同城市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构建方程(4),若调节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dfi$ )与自变量企业家精神( $sdbbrand$ )交乘项显著,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有激励作用,交乘项符号为正则是正激励。表8中的第(7)列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交乘项为0.009,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6。第(8)列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一般城市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为正,但不显著。与一般城市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明显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通常具备更加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更加成熟的金融科技应用,这使得企业家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城市的普及和应用,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和创业机会,尤其是在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便捷性和可负担性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动力<sup>[35]</sup>。此外,活跃城市往往拥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商业环境,这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数字普惠金融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更是创新生态的构建者和推动者。它通过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劲动能。

$$hqdi_{it} = \gamma_0 + \gamma_1 sdbbrand_{it} + \gamma_2 sdbbrand \times dfi_{it} + \gamma_3 dfi_{it} + \sum \gamma_k control_{it} + u_i + \delta_t + \xi_{it} \quad (4)$$

##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各地区每百万人拥有的老字号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采用2010–2022年山东地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明显。(2)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三要素及三要素的优化组合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起到中介传导机制。(3)企业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异质性,在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化历史中心城市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同样明显。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老字号转型升级。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创新创业基金,支持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建立企业家培训和交流平台,提供创业指导、管理培训等服务;推动学术机构和企业的

合作,加强对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支持,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人才。此外,在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方面,政府可以提供数字化转型指导服务,帮助老字号企业制定数字化发展战略;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投资数字化技术和设备;建立老字号品牌保护和传承机制,鼓励企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

二是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府可加大对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扶持策略,提供充足的研发资金支持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通过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项目,政府能够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和工人的技术水平,进而增强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此外,政府还需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通过提高社会信息化水平,促进数字技术在生产、管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实施与企业家精神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发展战略。对具有商业历史和中心地位的城市,特别是那些老字号企业集中的地区,政府应重点支持老字号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业,形成创新引领区和国际商务中心。这将有助于提升这些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提高其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其他城市,政府应鼓励发展与当地特色和资源相匹配的产业,同时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此外,应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通过构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为老字号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丰富的资源,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增长。

四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老字号企业的深度融合。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字号企业的服务,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试点区域,专注于服务老字号企业,以及构建专门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为这些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这些措施,降低老字号企业的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帮助其解决融资难题,从而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高志刚,李明蕊,韩延玲.企业家精神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J].管理学报,2023(2):25-43.
- [2] 程锐.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内收入差距:效应与影响机制分析[J].经济管理,2019(6):91-108.
- [3] 陈亮,冉茂盛.企业家精神如何影响区域创新效率?——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多维视角研究[J].软科学,2021(3):89-95.
- [4] 余东华,王梅娟.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改革,2022(7):61-81.
- [5] 胡永刚,石崇.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6(7):87-101.
- [6] 王文举,姚益家.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经纬,2021(3):86-94.
- [7] 孙桂生,唐少清,陶金元,等.企业家精神、创新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4(S1):454-461.
- [8] 聂长飞,程承坪,陈志.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共同富裕:来自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23(10):132-145.
- [9] 马忠新,陶一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19(8):86-98.
- [10] 郭瑞昭.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建构维度[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26-30.
- [11] 邵传林.企业家精神、地区营商环境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华老字号的新证据[J].南方经济,2024(1):39-56.
- [12]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 [13] CUNNINGHAM J B, LISCHERON J. Defining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1, 1(29): 45-61.
- [14] 彭花,贺正楚,张雪琳.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22(3):112-123.

- [15] 白少君,崔萌筱,耿紫珍.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23):178-182.
- [16]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17] 钞小静,王清.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12-20.
- [18] 周文,叶蕾.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17-28.
- [19] 姜奇平.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与逻辑结构[J].探索与争鸣,2024(1):132-141+179-180.
- [20] LI H, YANG Z, YAO X, et al. Entrepreneurship, Private Economy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4):948-961.
- [21] 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10):99-108.
- [22] 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管理世界,2020(5):52-66+9.
- [23]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4):1557-1580.
- [24] 孙豪,桂河清,杨冬.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2020(8):4-14+155.
- [25] 刘建华,闫静,王慧扬,等.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演进及障碍因子诊断[J].人民黄河,2024(4):1-7+14.
- [26] 李政,刘丰硕.企业家精神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了吗?[J].经济评论,2020(1):131-145.
- [27] 蒋长流,江成涛.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5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5-84.
- [28] TING CHEN, JAMES KAI-SING KUNG, CHICHENG MA.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0(631):2030-2064.
- [29] 孙英杰,林春,刘融冰.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9(1):152-160.
- [30] 张远记,韩存.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市场价值——来自“专精特新”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3(14):163-167.
- [31]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32] 周立,赵秋运.企业家精神、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80-93.
- [33] 胡厚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历史传承的视角[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6):1481-1496.
- [34] KHYAREH M M, AMINI H. Governance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Competitiveness, 2021, 13(2):41-64.
- [35] SETYANINGRUM R P, NORISANTI N, ALJUAIDI M, et al. Wome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Economic Growth in Indonesia[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3:975709.

(责任编辑:何 飞)